

讀沈津《顧廷龍年譜》



吳銘能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古今論衡 第 16 期 2007.6

年譜是很不容易撰寫的，不僅僅單純描述一人事功、履歷、家庭生活瑣事等，還需考慮與譜主交游對象之種種活動，以反映一個時代社會文化風尚，因此蒐集入譜材料就關係到一部年譜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頃近拜讀沈津撰作《顧廷龍年譜》，據他自己說，只花了一年四個月就撰成近百萬字的鉅作，而且還是利用平日下班後的業餘清晨及晚間與週末（星期六、日）假日（感恩節、聖誕節及各種假日），其驚人創作力與拼搏精神，實在令人佩服。儘管以如此快速的時間完成，但這部年譜的質量仍然是令人滿意的。揆其要素，厥有三點：

一、非比尋常的師生關係

沈先生與譜主有三十餘年交情的師生關係，也是譜主有意栽培的得意門生之一。譜主一生為中國圖書館事業奮鬥奉獻，作者既有幸長期隨侍左右，親聆指導讀書、寫字、鑑定古籍版本等專業知識，又受教誨待人處世應對進退修養，對於譜主學術事業與思想、生活等最為熟悉，所以在執筆撰寫年譜，彷彿就像打開記憶的留影機，描寫譜主的一生，也未嘗不是回憶自己過去的經歷，吟詠悲喜離合歲月！

二、完整的日記、手札與記事錄

有了上述這層師生關係，玩味年譜文字，可知作者係抱持一種感恩回報、飲水思源的莊敬態度，領受到一位藹藹長者循循善誘、逐步引導鑄造昔日青澀少年成為當今一位傑出文獻學者的歷歷往事。透過譜主一生完整而豐富記事備忘錄、日記、手札的線索，一一尋覓追蹤，則立體呈現一個時代活潑生動的縮影。尋常人欲蒐集譜主記事備忘錄、日記、手札等資料，恐不易短時內辦到，即使有意費力尋覓，也未必能夠完備齊全，而作者既有「近水樓臺」之便，又有與譜主在上海圖書館近三十年共事情感，積累廣大人脈提供往來書札、回憶錄等，更促成這部傑作早日殺青的條件。

三、功底深厚的學術涵養

作者一生供職圖書館，有朝夕摩挲文獻之便，又博覽群書，具有傳統古籍文獻深厚功底，已有《書城挹翠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翁方綱年譜》等專著刊行，馳名海內外學界，此書寫來可說駕輕就熟，一氣呵成。

這三項常人不易同時具備的條件，均聚於一身，促成這部年譜有一大特點，深刻反映上海合衆圖書館成立的經過情形，極盡描述當時張元濟、陳陶遺、葉景葵與譜主等人如何歷盡各種困難，搶救文獻於兵馬倥傯之際，逐步發展成擁有豐富珍藏的私人創辦圖書館，是瞭解上海圖書館事業飛躍茁壯最為珍貴的第一手材料。

譜主對上海圖書館事業發展投注一生的心血。今天上海圖書館的規模、收藏、管理與服務制度建立，是與譜主創辦合衆圖書館之關係分不開的。合衆圖書館創辦的目的，「是在搜集各時代、各地方的文獻材料，供研究中國及東方歷史者的參考，因為歷史的範圍廣大和它發生關係的學科很多，所以形式上不限於圖書，凡期刊、報紙、書畫、書札、拓片、古器、服物、照相、照相底片及書板、紙型等，亦均收存，務使與考史有關的東西，不致遭無人問津而毀棄」（年譜頁 88）。試以 1956 年 1 月 12 日條（年譜頁 522-523）說明合衆圖書館應該收錄資料的項目如下：

在工作中，先生認為：從廢紙中搶救歷史文獻，是蒐集和整理歷史文獻重要途徑之一，并就蒐集的範圍提出十二條意見。

- 一、革命文獻，如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法令、雜誌、日報、講義、歌曲、傳單、宣言等。
- 二、檔案，如告示、報銷、統計、公文、公報等。
- 三、地方志，如一統志、省志、府州志、縣志、鄉鎮志、山水志、寺廟書院志、地圖、地方調查表、鄉土志等。
- 四、家譜，如族規、分關書、家訓、祖先圖、世德記、姓氏考等。
- 五、社團記載，如報紙、雜誌、報告、傳單、章程、紀念冊、人名錄等。
- 六、個人記載，如日記、筆記、手札、訃聞、哀啓、壽文、挽詩、傳文等。
- 七、古代醫書。
- 八、賬簿方面，如商店進貨簿、營業簿、貨價簿、工廠的物料簿、工資簿、地主家的收租簿、完糧簿、民眾團體的徵信錄、家庭和個人的伙食簿、雜用簿以及婚喪喜慶的用費簿、禮物簿等。
- 九、迷信書方面，如善書、神道志、符咒、卜筮書、星相書、堪輿書等。^❶
- 十、民間文藝方面，如小說、故事、戲本、彈詞、鼓詞、唱本、歌謠、寶卷、詼諧文等。
- 十一、古典藝術書籍，如樂譜、棋譜、法帖、畫譜、遊戲書等。
- 十二、圖片方面，如照片、畫片、金石拓本等。

❶ 由於彼時大環境的侷限，將「善書、神道志、符咒、卜筮書、星相書、堪輿書等」均列為「迷信書方面」，時移境遷，今日尊重多元思想的學術研究，此類書籍很多學者從民俗學、心理學、神學、天文學、社會學、醫學等專業領域來探究，較為客觀深入，符合實際情況，可矯以往的偏見。

譜主提出上述蒐集和整理歷史文獻的意見，門類齊全而系統井然，可以說是通過長期實際摩挲資料歸納出的心得總結，如第八項言賬簿方面的細目，一般人沒有深刻經驗是提不出如此詳細見解的；因此，半個世紀過去了，這些見解非但沒有過時，而且很多有規模的大型圖書館迄今所做的典藏都無法超出其範圍。這是譜主宏觀視野有以致之。

作者在年譜內有意識地著力此方面撰寫，使得上海近代圖書館事業興起軌跡之衍變，展讀此譜，歷歷可見。這是作者眼光獨到處，也說明了譜主一生對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最大的貢獻。

譜主搶救文獻資料，有些是從書商處採購獲得，也有不少從垃圾堆中撿拾者，茲略舉幾則紀錄，以見梗概：

在中行別業門左廢紙鋪中檢得日本萬治二年（1659）吉野屋權兵衛刊《莊子鷹齋口義》，當中國南明永曆十三年也。（年譜頁 466）

王育伊來，贈《袁爽秋手札》三通，為在垃圾堆中檢得者。（年譜頁 470）

工作現場是紙屑飛揚的垃圾堆，先生和工作人員不顧塵垢滿面，汗流浹背，片紙隻字，祇要有資料價值，絕不輕易放過。經過連續十一天的辛勤勞動，搶救出一大批珍貴歷史文獻。從內容上說，有史書、家譜、方志、小說、筆記、醫書、民用便覽、陰陽卜筮、八股文、賬簿、契券、告示等。就版本而言，有傳世孤本明萬曆十九年刻《三峽通志》，流傳稀少的明本《國史紀聞》、《城守驗方》，明末版畫上品《山水爭奇》，還有不少舊抄與稿本。（年譜頁 520）

譜主一生從事古籍文獻版本考訂校勘工作，與圖書典籍未曾須臾或離（思想改造及文革時除外），浸淫文獻既久，不僅熟悉各個版本異同，還能考究其間複雜的學術流變。跋影宋鈔本《集韻》（年譜頁 649-650）說：

段氏據校之毛氏汲古閣影鈔宋本入藏於今寧波之天一閣，錢氏述古堂影鈔宋本今已歸之上海圖書館。此兩本皆出於北宋慶曆原刻。田世卿於南宋淳熙重刻之本，亦尚有兩帙，一為北京圖書館所藏，一為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所藏。



引自沈津，《顧廷龍年譜》附圖，頁 1。

即此南宋覆本，已屬人間瓊寶矣。今就毛鈔與錢鈔言之，兩本版式行款，完全相同，應為從同一底本所出，但錢鈔字畫不完，缺漏空白，而毛鈔則否，何也？竊謂缺字缺畫，審係原雕版片之漫漶，非印本紙張之殘損。毛鈔已經重修，所以不缺不殘。……五十年前，龍負笈燕京，從事《集韻》之學，先後承葉揆初（景葵）丈以過錄校郵示，張仲仁（一塵〔塵〕）丈亦以許勉夫（克勤）校本相假，均經移寫，未及研讀，而蘆溝事變，舉家南旋，此事遂廢。年來喜獲錢氏影宋鈔本，以為校訂譌訛尤為重要，……它日如能以淳熙本并予印傳，以供校勘，則更善矣。

把一書版本源流與己身經眼、交遊情形，隨手自然表出，學術與生命結合一體，典籍文化傳承宛然可見。在為裴先白藏《宋徽宗趙佶草書千字文》題跋（年譜頁648）一文說：

《千字文》為古代啓蒙讀物之一……周興嗣所撰者，最為通行，流傳至今，已成為家絃戶誦之本。童時塾師授讀，無不滾瓜爛熟，宜書家取以染翰。唐宋以後，釋道二家用以編錄藏經之序次。唐代名家所書《千字文》，如歐陽詢、孫過庭及僧智永、懷素、亞栖等。又敦煌出土尋常鈔寫者不下三十餘本。宋代書家如宋徽宗趙佶、高宗趙構、僧夢英，元代如趙孟頫，明代如祝允明、陳淳等書人尤喜以狂草揮灑，蓋《千字文》無重字，字體結構各盡所能，至或以為書學盡於此，恐未必然。余謂《千字文》人多熟誦，揮毫疾書，不須思考而命筆飛舞。此卷為趙佶四十歲時所作，精力充沛，一氣呵成，跌宕縱橫，毫無倦筆，勝其楷書瘦金體遠甚，可謂智巧兼優，宛轉自如，下筆有神矣。

譜主曾代表中國於1963年與1979年赴日本交流書法，又嘗為許多有名建築、出版品題籤，是當代著名書法家，寫這段跋文完全是行家本色，信手拈來，精采可讀，洵為溽暑一帖清涼劑。

譜主對於書法下苦工夫，除了從小興趣使然外，他從事圖書館工作性質，迭有機會接觸名家題識手稿，有時因業務上的需要，不得不注意此方面的修養。^②如有《穆天子傳補注備考》，書商以為是劉師培親筆，譜主能舉四例證明必非劉稿（年譜頁119）。至於譜主對中國文字與書法、碑帖見解，茲引錄片語已見其概：

^② 譜主1986年2月在上海市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會議上有言：「要整理古籍、整理稿本，不識字怎麼行？稿本和親筆尺牘，都是很重要的資料，假使字不認識，以意改之，全失真意，必致誤己誤人。希望培養古籍整理人才者，注意及之」（年譜頁664）。

作書之難，在能凝其氣韻，行真大小，馳赴腕底，若即若離，或疏或密，於放浪之中不失其規矩。（年譜頁 78）

以許書為說甲文、金文之階梯則可，若以甲文、金文正許書之繆則不可，蓋三種文字實有時代之不同耳。要之甲文、金文與《說文》之差異，其間必尚有沿革，倘能求得此沿革，則考釋古文迎刃而解。研尋此沿革，必先從古文字偏旁細加分析，偏旁不能確定，所說之字亦即含糊，字認未確，考證古史終多附會，各人各考，百無一同。（年譜頁 125-126）

舊拓碑帖必須筆筆細校，原石、翻本，遂能判析。我以為研究碑帖有三個方面：一、史料，廣收拓片；二、藝術，選書法之優者；三、版本，廣訪舊本精校，作出結論。方藥雨《隨筆》有椎輪大輅之功，今日遠勝之。（年譜頁 542）

閱翁方綱手摹碑帖尺牘，“具見其法，金石之精勤，盛名之下，非偶然也。”（年譜頁 542）

其他有關譜主如何鑑定古籍真偽、選購古籍以及與友朋商討版本問題，本譜迭所反映，就不一一瑣碎徵引了。

還有一項特色，近代學林諸多軼聞掌故，透過本譜的呈現，使吾人大開眼界，增廣見識。如顧頡剛主持齊魯大學，有致譜主信函提及對近代學者呂思勉、錢穆、鄧之誠、葉德輝、皮錫瑞諸人學術的評價：

刻此間已聘呂誠之先生為教授，特許其在滬研究，如賓四兄之例。呂先生《通史稿》積疊已多，如能年出一二冊，則五六年可畢。此書一出，鄧氏《二千年史》自然倒墜。賓四兄遲遲不行，現不知能成行否？如猶不能來，則甚望其能在通史方面，與呂先生同著力也。自來言目錄學者，條理清楚無如《書林清話》，不知吾叔能將此書標點作索引，兼為之注否？如能如此作，則大學中目錄學一課，可取是作課本矣。姪侯〔候〕在此定心後，亦當將皮氏《經學通論》如此整理，俾充大學經學史課本也。（年譜頁 127-128）

對於皮錫瑞《經學歷史》的成書經過，有段鮮為人知的秘辛云：

訪劉文興於旅館，時在抄錄翁方綱《四庫全書提要稿》，有因違礙而刪去者、有為紀昀改定者、尚有與刻本不同者。此從劉承幹處借得，約百餘冊。座有柳貢禾君，其云陳慶年為其親戚，曾面告皮錫瑞《經學歷史》本為陳氏擬撰之稿。時同在西湖書院，因為皮述其事。皮即詢體例何如。陳並以所定章次示之。皮欣然請為任之，囑稿三月而成。此外間尚無人知之。（年譜頁 133）

對於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與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出版牽涉人事糾紛則說：

徐森玉來，約晚間訪劉次羽，閱其祖庭所撰《左氏疏稿》。……晚飯後，徐森玉來，托借平館書二十餘種。旋即偕至古拔路劉次羽寓，劉捧出《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第一卷，為劉文淇撰，以後為劉毓崧、劉壽曾撰，實出壽曾手為多。計原八本，清稿七本。清稿本中有貼籤甚多。原稿有凡例三則，為清稿本所未錄。

前聞人謂劉氏三世所撰《左傳疏》，失於此次避亂蜀中，實係誤傳。次羽云，辛亥間曾由申叔攜去蜀中，又傳申叔續纂甚多，亦非事實。次羽出示《申叔遺書》，武寧南氏所排印，當時托錢玄同經理其事。南與徐森翁山西同學，故曾助搜稿本甚勤。成書後，玄同即請蔡子民撰一事略冠首。南以示張溥泉，張蔡有隙，頗致微詞，而南遂不敢發行。玄同知而大怒。南又招森翁商善後，遂定送至南京者皆去蔡文，以陽應之，後即遭亂擱置矣。近始發出，恐尚不能暢通耳。森翁又謂，其中有《說文校語》一種，嘗有《說文》一部，批校甚佳，未題名，而書賈謬署‘申叔’之名，實不足信也。次羽曾校印壽曾《傳雅堂集》，見贈一部。（年譜頁 178-179）

劉師培學問淵博，著作等身，但對其人之品格，譜主則流露頗為不齒態度：

《劉申叔遺書》索得一部，陳陶遺見之，言其照相係改名金少甫時之像。又言其一生誤於夫人為多。陳陶遺為端方所執，即以申叔投去密報，而知其行迹。“端謂，陶老，汝熟人劉某已在此，汝何妨亦來。陶老之見賣，雖出申叔，實其夫人使之者也。”申叔著述雖富，行為鄙陋，何足重哉！（年譜頁 249-250）

學人討論古籍校注問題，有的難以索解，留待後來者繼續研究。茲抄錄 1956 年 4 月 12 日譜主致顧頡剛信中的一段：

我與煦華選注《漢書》，雖已交卷，但出版社方面要加選《司馬遷傳》一篇。現在有兩句，我們注不出，請賜教。‘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宜〔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周召是否周公召公，既稱周公，何以宣周召之風！如指周南召南，亦不能解。幸撥冗示及，為叩 各家均無注及。（年譜頁 524）

關於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目錄與譜主關係密切，這一段歷史很多人並不知道。通讀本譜，吾人才曉得譜主 1932 年曾應燕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洪業邀請，擔任燕大館採購圖書的工作，又擔任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駐北平採訪處主任，前後做了六

年圖書採購工作，^③其後 1941 年哈佛燕京館首任館長裘開明又迭次乞請校勘《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漢和圖書館目錄》的訛誤（年譜頁 27、193-196、211-220）。今天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以其豐富而有效率的圖書服務而馳名於世，實為早期書目編輯完善奠定基礎所致，則譜主曾經下過心血是不容忽視的。

譜主與顧頡剛、譚其驤在 1934 年春季商定創辦禹貢學會和《禹貢》半月刊，乃是為了「研究中國地理沿革及民族演進史的目的，為了當時強鄰肆虐，侵略不斷，作沿革地理研究，想對民族復興工作有所幫助」（年譜頁 33），現實情勢與學術研究理想緊密結合，在近代學術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爾後，日軍侵略中國造成的人員傷亡與破壞，禹貢學會和《禹貢》不得不被迫中斷，^④殊為可惜！至於個人身心造成的傷害，顧頡剛於 1941 年 10 月 29 日致譜主信件言之最詳：

姪年來人事愈冗，且蓉渝跋涉，不勝其勞，顧念此身已成傀儡，一切聽人擺布。雖欲脫出此境，而勢固有所不可，奈何！奈何！內子病勢依然，身體偶一勞頓，或精神偶受刺戟，熱度即行增高。姪甚不願來渝，至兩地心懸，無以相慰，而竟不得不於病中離散，夫婦之道，苦亦甚矣。承囑為誦詩弟撰傳，夫豈不願，而兩年以來，既病且忙，迄今



1934 年 4 月 14 日，攝於北京顧頡剛家後園。坐者為顧頡剛，左一為顧廷龍。引自《顧廷龍年譜》附圖，頁 2。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禹貢學會編審文章，左為馮家升，右為顧廷龍。引自《顧廷龍年譜》附圖，頁 3。

^③ 另參哈燕館前館長吳文津言「創館之初，館長裘開明（閻輝）先生致力於漢學典籍之蒐集，並得北平大學洪業（煨蓮）教授及該校圖書館顧廷龍（起潛）先生之助，在北平書肆代為選購中國古籍經年，中頗多善本」。見《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序言〉。

^④ 1934 年 3 月 1 日，《禹貢》半月刊出版（年譜頁 33）。1936 年 5 月 24 日禹貢學會召開成立大會，選舉顧頡剛、錢穆、馮家升、譚其驤、唐蘭、王庸、徐炳昶七人為理事，劉節、黃文弼、張星烺三人為候補理

尚未完稿。人生不自由，一至於此，可為浩歎！然此稿常存行篋，祇須得一日之暇，當有以報命也。姪三四年來，血壓增高，極易疲乏，惟祇要睡眠不太壞，頑軀尚可支持，較之履安好得多矣。渠病腎結核，不割則為慢性之死，割則又恐立死刀下，毫無善法處置，祇得委心任運耳。戰亂四年，先喪我弟，繼奪我父，今我妻又復奄奄待盡，如何能有好懷？而人事橫迫，無一刻之安，即使鐵打之身，亦將無以支持，況本是衰弱者乎？言之增慨。到渝後，住西郊小龍坎，其地離城三十里，較可安心任職。然以人事之多，又必須常常住城，即此跋涉亦復大苦，真可謂勞碌命也。（年譜頁 214-215）

則亂世歷盡艱辛境遇，各地輾轉奔波、流離失所困厄，上引所載可為「實錄」，誦讀凝想，一字一句，驚心動魄，予人一掬同情之淚！

日軍侵略這段時期，譜主在日記紀錄了陳寅恪、袁同禮與蔡元培家人等的遭遇，亦令人為之動容。1942年11月3日日記云：

陳寅恪所著《唐書外國傳注》、《世說新語注》、《蒙古游牧記注》及校訂佛經譯本（據梵文等）數種，裝入行篋，交旅行社寄安南，不意誤交人家，以致遺失，無可追詢，一生心血盡付東流。以此心殊抑鬱，體遂益壞，無三日不病。^⑤在港淪陷後，米面〔麵〕時向葉氏告貸，守和亦如此。再可憐者，為蔡子民夫人及其兩女，亂後遭劫兩回，所有服物再搶僅存，玉翁命家中取衣相贈，而幼女已病臥。蔡夫人并長女三人覆一薄被，蜷臥其中。中央研究院及北大舊雨，竟無一人顧念及之。子民生前公私之錢，界限極清，致後來身體虛弱，醫令打補針，一計積蓄無多、竟不針治，亦可敬矣。（年譜頁 268）

傅斯年後來堅持開除在日軍統治下服務「偽北大」知名教授，這是人皆盡悉的一段史實。譜主對於容庚等人為生活所迫處境，是寄與同情的：

聞希白（容庚）、因百（鄭騫）皆入北大訊，為之歎息，尤以希白為可惋惜，生計逼人，復何言哉？（年譜頁 245）

事，于省吾、容庚、洪業、張國淦、李書華為監事，顧廷龍、朱士嘉為候補監事，並由吳豐培、顧廷龍主編《邊疆叢書》（年譜頁 53）。1938年2月22日譜主覆葉景葵信有「禹貢研究已告星散，賓四聞已入滇」語（年譜頁 68），是則禹貢學會維持不到兩年，足見戰爭對本期學術破壞之嚴重。

⑤ 蔣天樞云「最為巨大之損失，在先生任教昆明時，由他人代交滇越鐵路轉運之兩大木箱中外圖籍，全部為越南人盜去（另以滿裝碑塊之兩大木箱換走）。聞其中僅《世說新語》一書，即有批校本數部之多。先生生平所著書，大多取材於平素用力甚勤之筆記，其批校特密者往往即後來著書之藍本。以故，長沙及滇越鐵路失去之書，無異間接減少先生著述若干種。竊意先生初聞失書時，當有不眠之夜也」，則可與此段日記印證。蔣氏之言見〈陳寅恪先生讀書札記弁言〉，收在《陳寅恪集·讀書札記一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前。

希白因任偽北大課，燕大復校，不再聘任，輿論亦不佳，然大小奸逆，有能搖身一變又甚得意者，蓋所謂文人地位甚低，目標甚大者歟！（年譜頁 363）

對於洪業等人不屈服日本人淫威下志節，^⑥ 譜主表達極高敬意：

五月二十四日，接聶崇岐信，告洪業、鄧之誠、陸志韋、劉豁軒四君皆已獲釋。先生爲之欣慰。諸君歷劫不磨，不愧人師，當作書問安。（年譜頁 248）

日軍侵略對學術文化浩劫，趙世暹有一封信說他「收水利圖書近三十年，所有刻本、排印本，廿六年冬，皆被燒毀，稿本、罕見本及寫本圖亦損失許多，今所剩者，僅一大箱耳」（年譜頁 429），這可以作爲一個時代見證縮影。

知識份子曲學阿世，屈服於政權下的嘴臉，本譜描繪得不多。善於讀書者，有時並不需要作者把話說盡，貴乎能夠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往往一沙一世界，從一滴水可以測觀大海。如 1965 年 5 月條（年譜頁 564）說：

郭沫若撰寫了一篇《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的文章，引起了《蘭亭序》真偽的筆戰。

這兩行文字平淡無奇，一般人可能兩眼略略滑過，毫不以爲意。有心人尋索可略知其事經過：

記得《蘭亭序》辯論之興起，許多人違心附和，當時我客廣州，常與令尊過從，譚及學術問題不應隨政治風向轉變。令尊對《蘭亭》始終認爲王氏真跡，對當時某些大人物之論點深以爲憾。我亦有相同觀點，自知人微言輕，於是建議由我提供近年考古發現之雲南東晉昇平三年墓題句，還有朝鮮壁畫墓東晉人題壁畫，它一再證明東晉時期的書體已由隸書演變成今楷。我國邊遠地區尚且如此，江左一帶特別是王羲之父子不當保存隸法。……當全國絕大多數學者一致指責《蘭亭》僞本時，而令尊敢冒大不諱，義正嚴辭，批駁氣勢洶洶的謬論，不畏權貴，維護學術尊嚴，此種品德，實在難得可貴。……^⑦

^⑥ 翁獨健、王鍾翰編選，《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1980年1月序云「在抗日戰爭期間，先生留居北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起，竟與已故陸志韋、鄧之誠等先生同被日軍逮捕入獄，堅持鬪爭，將近半載，出獄後一直拒絕爲日僞工作，表現了堅貞不移的民族氣節」。另參容庚〈頌齋自訂年譜〉1941年云「十二月八日，日、美宣戰，日本憲兵接收燕京大學，捕陸志韋、陳其田、趙紫宸、趙承信、劉豁軒、林嘉通、張東蓀、戴艾楨及洪煨蓮、鄧之誠、蔡一謬等人」，見曾憲通編，《容庚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頁 666。

^⑦ 此爲楊仁愷的回憶，收在商承祚，〈論東晉的書法風格并及蘭亭序〉文後，見《商承祚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頁 440-441。

這是楊仁愷給商承祚哲嗣信的話，這裡的「令尊」，是指商承祚，當時發表了〈論東晉的書法風格并及蘭亭序〉，表明他不能苟同郭沫若說《蘭亭序》是僞本的立場。楊仁愷所言「有人違心附和，乃指啓功、徐森玉諸先生，而所謂得罪大人物，自是康生等人」。⁸這場論戰人物大多塵歸黃土。以上述提到書法界名人啓功自己對這一段過去的回憶為例，他說：

郭老又結合了一些新考證，寫了一篇《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僞》，說南京挖出一些王家的墓碑，上面的字也都是方頭方腦的，因此以柔美見長的《蘭亭序》肯定是假的。不但字是假的，就連文章也是後人篡改的。在這之前我曾寫過一篇《蘭亭帖考》的文章，認為《蘭亭序》是真的（指《蘭亭序帖》原作是王羲之的手筆，現流傳的都是根據原作摩寫的），並詳細地考證了現在流傳的各種蘭亭版本，在社會上很有影響。文中自然不可避免地也提及李文田等清人的觀點。所以要討論這個問題就須我重新表態。當時郭老住在什剎海，錢杏邨先生（阿英）住在棉花胡同東口，郭老就讓錢杏邨找我談話。……我聽了暗暗叫苦不迭，心想我原來是不同意隨便說《蘭亭》是假的，一直堅持現存的定武本和唐摹本都是根據王羲之原作的複製品，這可怎麼轉彎啊？但形勢已經非常明顯，這已不是書法史和學術問題了，又把學術問題政治化了，而且是“欽點”要我寫文章。從錢先生家回來，我仔細研究了郭老的文章，終於找到一個可以轉身騰挪的棱縫。郭老的文章中有一個明顯的漏洞：他認為王羲之的《蘭亭》應是方筆的，否則是假的，但王羲之流傳下來的作品不僅《蘭亭》一種，如在日本發現的《喪亂帖》，它是唐人根據王羲之真迹勾摹的，也是那種柔美的筆法，這該怎麼解釋呢？郭老只好說《喪亂帖》和北碑體的“二爨”碑《爨寶子》、《爨龍顏》“有一脈相通之處”。郭老當時這樣說也許言不由衷，但這明明是不符合事實的，對碑帖稍有涉獵的人都知道這二者截然不同，毫不相干，非要說“一脈相通”那無異於瞪著眼睛說瞎話。……四千多字的考辨文章當天寫好了，題為《蘭亭的迷信應該破除》。晚上阿英就派人取走，直接送到郭老家。郭老一看大為高興，第二天（星期六）一大早就把稿子交給光明日報社，第二天（星期天）就見報了，可見它是一篇特稿。

⁸ 同前揭書，頁441，「說明」。

過了幾天郭老去找陳校長，……郭老一見陳校長就高興地說“你的學生啓功真好，他說《蘭亭》是假的，很好，很好。”陳校長本來是主張《蘭亭》為真的一派，有的人向他請教應臨什麼帖的時候，他常向人推薦《蘭亭序》，現在也只好微笑著捋著鬚鬚跟著搭訕道“那是，他是專家嘛！”郭老趁機說道“你不也寫一篇？”陳校長應付道“我老了，眼睛不行了，寫不了了，等恢復恢復再說吧。”算是搪塞了過去。……

但後來為什麼沒在這上面做更大的文章呢？可能是因為參與這一論辯的圈子太小，畢竟只能是書法界有限的人，很難達到由此發動更大規模政治鬥爭的目的。……後來他們果然找到了更好的目標，那就是《海瑞罷官》，從此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這種拿學術討論來釣政治魚的手段實在是知識份子最害怕、最頭疼的做法。後來我在編輯我的文集時堅決刪去了這篇文章。^⑨

則這場論戰在近代史上學術與政治糾葛纏繞下，讀者就不難窺知其中的曲折複雜情形，今日似很難以「非黑即白」二分法簡單評說是非。

除了上述略舉內容外，筆者認為在譜後有三點做法，值得往後年譜撰寫者參考云。一是〈顧廷龍著述繫年〉。把譜主一生的著作詳細列出，含有專著、編輯及主編、論文及文章、校書目錄，均依時間先後順序排列。這份清單基本上涵蓋了譜者在學術文化上的成就。至於查不出撰寫時間的文章有十一篇，也錄出篇名，留俟以後研究者核實。二是編有〈人名索引〉。這個部分表面上可有可無，似乎無關緊要，但其實大有用處。蓋透過這一長串的人名，可以很快知道與譜主關係較為密切的人物有王同愈、王煦華、任心白、沈津、沈劍知、沈範思、王伯繩、李英年、李宣龔、吳織、吳湖帆、吳豐培、林宰平、秉志、周一良、洪業、胡適、胡道靜、胡樸安、冒廣生、姚光、容庚、袁同禮、徐森玉、章鈺、郭石麒、郭紹虞、張元濟、張秀民、張樹年、陳垣、陳叔通、陳陶遺、陳漢第、葉恭綽、葉景葵、楊金華、單鎮、聞宥、趙萬里、蔣復璁、裴延九、諸仲芳、鄭振鐸、潘天禎、潘承圭、潘季孺、潘景鄭、潘博山、劉垣、劉承幹、冀淑英、錢存訓、錢鍾書、錢鶴齡、謝仁冰、謝國楨、聶崇岐、瞿鳳起、譚其驥、嚴鷗客、顧衡、顧誦芬、顧誦詩、顧頡剛、顧燮光、顧翼東、高橋智等人，讀者如果沒有充裕時間，不必從頭翻閱，只須隨意尋索，則交織譜主一生人際網絡，宛然顯見，省時又方便。三是有以師友為主的〈人物小傳〉。這個部分在作者先

^⑨ 趙仁珪、章景懷整理，《啓功口述歷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212-213。

前的一部著作《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內也曾經嘗試做過，如今做來自然遊刃有餘，意態從容。

本文開頭即言作者與譜主有三十餘年非比尋常師生關係，身受栽培成才，這是作者念念不忘的。譜主對於古籍整理、出版與培育人才等見解，提出了十條很重要的建議：一是培訓人員，老中青三結合。二是先應把本子整理，以便於標點。三是培訓專研人員，大學文科應設古典文獻學系，創設研究所。四是已經有人翻譯或注釋的古書，希望速為付印。五是印刷部門應成立排繁體字的車間。六是編校古書，應加以完全的標點符號並專名號。七是編選《中國善本叢書》，質量、數量應超過《四庫全書》。八是徵求專門著作入藏。九是摸清家底，各省市自治區圖書館應編就館藏線裝目錄或善本目錄。十是保護古書，培養修復人才（1981年12月條，年譜頁632-633）。這些建議實際上已勾勒出近代古籍整理、出版與研究方向。^⑩譜主持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合中國大型圖書館專業人才，群策群力，費盡超過十年的光陰完成，以及作者所以應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之邀編撰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鉅作，與譜主的支持是分不開的，^⑪而這即是體現了第九項「摸清家底」方向，為圖書館員在圖書館管理與研究實例，具有示範作用，饒富意義。

作者撰輯《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是由譜主所指定的題目，但尋溯源頭卻發軔於1943年。譜主在當年4月26日為姚光跋《復初齋文存》有云：

蘇齋佚文甚多，余曩為燕京大學圖書館訪得方小東輯《蘇齋題跋》一冊，多集外文而猶有在佚目之外者。近時各家景印碑版書畫往往有翁跋，若而錄之，所獲甚可觀。即老人所著《清儀閣題跋》外，文無專集。享壽既長，筆墨又勤，平生撰文，奚止僅此。合眾圖書館藏楊寶鏞校《清儀閣題跋》錄補

^⑩ 另參1981年11月17日條「“整理這些古籍，要有幾個步驟：校勘、標點、注釋、翻譯等。校勘要搜集眾本；標點要讀懂古書；注釋必須參考歷代學者的解釋。廣求各說，折衷一是。”並提出，要做到這一點，建議編索引；群經諸子必須完全標點出版」（年譜頁632）。

^⑪ 1991年9月29日致沈津信有云「您有赴哈佛之意，我很贊成，他們條件好，編書志，與您很適宜，待遇亦較優。我與‘哈佛燕京’還有點感情，我助裘開明編卡片，校書本目錄，您必知之」（年譜頁727）。1996年2月23日致沈津信云「我有一事奉托，您便中留心搜集一點裘開明先生的遺事，他來燕京，討論分類，皆尚相契，頗欲寫一點紀念文字。如果年隔已久，找不到了，亦就算了。裘之後任，是否即吳文津繼任？吳延請您去哈佛，編撰書志，他有見地，亦能識人，為事業著想。忠於事業之人，最可欽仰」（年譜頁776）。

至於譜主如何助裘開明編卡片情形，譜主有筆記本云「哈佛卡片在燕京編後，複印一式數張，亦由余主之。皆經裘開明先生同意而行，亦舊例也。印卡片，先用紫墨水寫實片樣張，覆蓋膠布上，可連印若干份，很方便」（年譜頁31）。

題識若干則，可徵所佚亦不在少。倘好事者掇拾遺文，俾習金石之學者有所觀摩焉。（年譜頁 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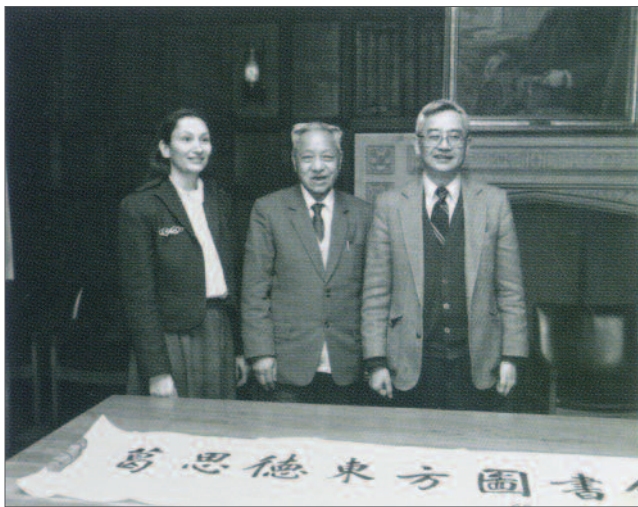
實際上作者一生學術生涯受惠譜主影響，其〈學術事功俱隆 文章道德並富——回憶先師顧廷龍先生〉長文已有完整披露，¹²但本譜反而不如上文詳細，建議讀者取此與本譜合併對讀。

任何一部著作很難做到完美無瑕，¹³且校書如清掃落葉，永遠掃不淨盡。

譜前附有多張與譜主相關照片，使本書增加了可讀性，但其中第 7 頁有題寫美國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額的照片說明云「右一為該館館長，中為顧廷龍」，其實，應該說「左為該館館長白迪安（Diane Perushek），¹⁴中為顧廷龍，右為余英時」。

本譜有許多錯別字沒有校出，茲隨舉若干說明。

有因繁簡字體轉化形成訛誤者，如「足徵」誤為「足征」（頁 44 行 8）、「拮据」誤為「拮據」（頁 81 行 12、頁 394 行 9）、「米麵」誤為「米面」（頁 268 行 13）、「麵食」誤為「面食」（頁 269 行 23）、「澹生堂」誤為「淡生堂」（頁 365 行 8 及行 9）、「輕鬆」誤為「輕松」（頁 439 行 22）、「請准」誤為「請準」（頁 535 行 8）、「西嶽」誤為「西岳」（頁 561 行 11）、「呼籲」誤為「呼吁」（頁 621 行 7、頁 674 行 5）、「徵得」誤為「征得」（頁 624 行 5）、「徵集」誤為「征集」（頁 630 行 24）。



1989 年 3 月應邀訪問美國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並題寫館額。左為該館館長白迪安（Diane Perushek），右為余英時教授。引自《顧廷龍年譜》附圖，頁 7。

- ¹² 這是一篇總結顧廷龍先生學術事業最為全面詳細的文章，見《文獻》2000.3：4-19；2000.4：4-25。
- ¹³ 本譜有些問題的錯誤，讀者可參見王雨霖撰，〈《顧廷龍年譜》舉正〉，收在《博覽群書》（北京：光明日報社）2005.11。
- ¹⁴ 年譜頁 699 云：「三月六日，鄭培凱開車送先生去新澤西州的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參觀，並看了敦煌卷子。又應該館白迪安（Diane Perushek）館長之請，題寫了“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額」。

有因字形接近而混淆者，「不能領」誤為「不能領」（頁 38 行 20）、「百朋之錫」誤為「百朋之錫」（頁 45 行 10）、「永清縣志」誤為「水清縣志」（頁 65 行 8）、「冷堆」誤為「冷堆」（頁 110 行 20）、「上鎖」誤為「上銷」（頁 133 行 15）、「熟象」誤為「熟象」（頁 173 行 4）、「未見」誤為「未見」（頁 450 行 11）、「真贗」誤為「真贗」（頁 467 行 15 及行 21、頁 510 行 9）、「宜周召之風」誤為「宜周召之風」（頁 524 行 12）、「張一馨」誤為「張一馨」（頁 650 行 1）、「縱一葦之所如」誤為「縱一葦之所知」（頁 659 行 3）、「沒入石棧中」誤為「沒入石棧中」（頁 659 行 25）。

其餘有不察而未校出者，「會議記錄」誤植為「會會議錄」（頁 199 行 16）、「遠勝絹縑鈍創蔡倫」句衍一「鈍」字（頁 681 行 14）、「圖府巍巍建築築新」句衍一「築」字（頁 695 行 27）、「管錐編」誤為「管錐篇」（頁 947 行 9）等十餘處。

另外有些可斟酌的疑問，敬謹提出與作者商榷。

1939 年 10 月 16 日條（年譜頁 92）引張元濟來信云「昨得袁君守和來信，為充實《圖書館月刊》、《季刊》材料起見，屬為代求」，尋詣上下文義，這是對期刊的泛稱，非專指這二種刊物，刊名號可刪去。

1948 年 8 月 1 日條（年譜頁 433）張元濟為《番禺葉氏遐庵藏書目錄》作序，作者特注明「此篇誤為先生所撰，收入《文集》P.139」，這是作者查對工夫細膩處，不料，忙中有錯，在〈顧廷龍著述繫年〉欄 1948 年 8 月條（年譜頁 831）失檢，仍將此序列入。

〈顧廷龍著述繫年〉欄 1985 年 7 月條（年譜頁 835）有〈張元濟與合眾圖書館〉文章，1986 年 6 月條（年譜頁 835）亦見有〈張元濟與合眾圖書館〉文章，兩者重複，翻閱本譜正文，應以前者為是。

1954 年 3 月 12 日條云「合眾圖書館改名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而在次年（1955 年）2 月 25 日條卻云「經上海人民政府批准，合眾圖書館改名為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從而成為專事收藏歷史文獻的專業圖書館」，這兩條紀事牽涉到上海市圖書館發展歷史，是很重要的問題，不可輕忽，而兩者記載竟整整相差了一年，未審何者為是？細覽作者徵引資料來源，前者為《合眾圖書館小史》，後者是《上海圖書館事業志》與《上海市公共圖書館紀事》，皆具有權威性，作為讀者實很難判斷正確時日。

1959 年 9 月 22 日條云「為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在先生的策劃和推動下，上海圖書館舉辦『珍貴書刊展覽』，展出革命文獻、近代報刊、古典文獻等珍貴館藏四百七十七種」，「慶祝建國三十周年」應為「慶祝建國十周年」之誤。

1998年4月條云「是月，錄鄧廣銘語：『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即題其《鄧廣銘紀念文集》」（年譜頁805），按此語原始出處，為梁啓超晚年住進協和醫院撰作《辛稼軒先生年譜》未完，最後的絕筆語，由其弟梁啓勳所證實，且見於原著最後一頁，鄧廣銘為梁啓超學生，曾著有《稼軒詞編年箋注》，宜其熟悉此語。

最後筆者不能不表示一點遺憾。無論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或者是對日抗戰時期，儘管物價騰貴，生活艱苦，¹⁵譜主所處社交圈子與學術文化氛圍之下，猶見切磋共學、相得融洽愉悅情懷，但新中國建立不久，轉入知識份子改造運動與文革時期，那種談讌論學的人際關係與環境都已蕩然無存了。譜主事後有感歎「十年動亂暴作，老妻臥病，憂皇而歿，余則被幽服勞，身丁變故，萬念俱灰」（年譜頁567）。在1959年7月24日顧頡剛致譜主信有言：

剛去年參加運動一年，不勝勞累。又晚上開會，激發失眠症甚劇，不得已多服安眠藥，而西藥不堪久服，其後竟致無效，精神遂一蹶不振。而既居北京，處處開會，久無暇日，加以今年注重業務，定有計畫，必須完成。諸端逼迫，體益不支，祇得請準〔准〕組織，到青島療養。年日以長，體日以衰，而事日以多，其為苦痛，何可勝言。

以這部年譜達百萬字之多，內中學者名流璀璨雲集，風華文采，令人嚮慕，但文革「在劫難逃」，其間內容則明顯貧乏單調，以1966年、1967年、1968年、1969年、1970年、1971年、1972年、1974年、1976年等觀之，正當譜主六、七十歲學問思想臻於成熟極境，平均每年僅約有一頁的篇幅草草留下，其時譜主的生活，可以1969年10月下旬至11月15日條為例：

先生隨上海圖書館所有工作人員一起，在工、軍宣隊帶領下，去上海近郊曹行公社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先生在“曹行”期間勞動的內容有：採棉花、揀棉花、鋤地、撒肥、搬稻、拾稻穗、裝車等。也吃憶苦飯，並參加“鬥批會”。

¹⁵ 1941年12月20日日記云「日為米煤瑣屑，攪其胸臆，而無人不然」（年譜頁223）。

1942年3月12日日記云「比來時為開門七事所擾，煩極，苦極。釜魚幕燕，寧有安樂之日乎」（年譜頁236）。

1942年3月13日日記云「日來為七事所擾，不能安心伏案，苦甚」（年譜頁236）。

1942年3月30日日記云「夜，偕內人赴‘青年’購物，四月一日盛傳百物皆須漲價矣，或稱漲三成、四成、五成不等，民不聊生矣」（年譜頁240）。

在 1975 年 1 月 13 日條云：

上午聽傳達計劃會議精神。下午參加市裏統戰小組學習。

這是近代學術史上上一輩人共同的噩夢。不獨譜主如此，過去我所見金毓黻的《靜晤室日記》亦然。在進入知識份子被改造的年代，不斷被迫寫檢討，強制學習政治理論，日記內容不再是文史讀書筆記，而是無用的觀樣板劇、看宣傳電影等荒唐事，把大好青春消磨耗掉，人才竟是如此糟蹋浪費的！

拜讀本譜之餘，筆者對作者平生師友風誼，頗為忻羨，而譜主晚年最為惦念不忘者厥有三事，一是與顧頡剛合作編纂《尚書文字合編》，這部歷時六十年的鉅作終於在譜主九十三歲高齡正式完成出版，了卻了一樁心願；二是補編早年著作吳大澂的年譜，這是其一生蒐集資料心血所萃；¹⁶三是譜主留下豐富而精采的日記、手札、讀書筆記，在其人生最後盡頭已意識到整理這些紀錄的重要性，可惜未克竟此即駕鶴西歸。¹⁷由年譜透露一鱗半爪訊息，有諸多言及學術研究者，極具有參考價值：

閱《趙惠甫親朋手札》，曾紀澤為天津教案大罵李鴻章漢奸，此批信有豐富史料，暇當細讀之。（1960 年 8 月 2 日條，年譜頁 539）

下午，閱《能靜居師友手札》、《應敏齋師友手札》，後者中馮焌光札多言與外人交涉事，頗多掌故。（1960 年 8 月 3 日條，年譜頁 539）

閱《讀史方輿紀要》稿本，校得顧祖禹筆數條。（1964 年 7 月 3 日條，年譜頁 562）

剛去歲曾見考古所新發得《漢石經》殘石一幅，其中《皋陶謨》‘朋淫’作‘鳳淫’，可證陸德明《莊子釋文》之說。惟有一極不可解之謎，則《禹貢篇》冀州‘厥田’之上有一‘黑’字，似原文為‘厥上惟白壤黑’，或謂冀州為白

¹⁶ 1994 年 3 月 27 日致李國慶函云「我昔編著過一部清季學者吳大澂的年譜，現在要作補編。尊處收藏明清尺牘甚富，其中有吳大澂的尺牘不少，可否複印給我？或者拍攝膠卷亦好」（年譜頁 744）。

1994 年 5 月 12 日致高橋智函云「《尚書》工作結束後，打算訂補《吳大澂年譜》，現已蒐集到不少昔所未見的資料」（年譜頁 745）。

1995 年 5 月 12 日致吳織函云「《吳大澂年譜》一定要補訂一下，材料得來不易，一縱即逝，至少有原本的二分之一」（年譜頁 762）。

1995 年 12 月 30 日致傅璇琮函云「再有《吳大澂年譜》，原名《吳憲齋先生年譜》，曾由燕京學報出版，列為專號之十。後來所得新材料甚多，渴欲補充，約十萬字。假吾數年，必能成之」（年譜頁 773）。

¹⁷ 顧誦芬在《顧廷龍年譜》之〈後記〉有謂譜主對版本學、目錄學、圖書分類學及圖書館管理方面的研究心得及經驗，大部分散記在日記、信札、筆記本和歸類於各類紙袋內的紙片上。這些資料除日記（1939 年至 1980 年）曾由吳織全部謄寫過以外，其他均未經過系統整理。

黑兩色兼備之土耶？然白壤為鹽鹼地，實有明徵。而除鹽鹼地外，則為黃土平原，此‘黑’字甚難解釋也。此石發見後，尚未發表考釋文字，吾叔如欲得此，剛可通知夏鼐同志，囑其將拓本寄上付刊也。又李遇孫所作釋文，吾叔曾謂以新出土之六國文字校之，謂非宋人偽造，亦乞早日寫文發表，此吾叔一生學力所萃，尤不可遲遲為之。¹⁸剛甚悔八十以前未將筆記著力整理，到今乃有心無力，故敢以為請，乞斟酌情況，搶時間完此心願為荷。日記本承代印十冊，此債必須奉還，幸勿客氣。大足文管所曾有信來，囑作文表揚，知吾叔去年亦往觀，然此出宋人手，在藝術上遠遜雲崗、龍門，實無可說耳。（1979年元旦條，年譜頁606-607）

去年在成都參觀四川省博物館獲見孟蜀所刻隸古定《尚書石經》殘石兩塊（《禹貢》），尚有及真書《石經》五塊（有《易》、《書》、《詩》、《春秋》），與通志堂本相校，完全相同。後讀馬叔平《凡將齋金石論叢》曾有記及，但總數似尚缺一塊，我乞得一份拓片，現在裝裱中。……聞山西省在普查中發現應縣之遼刻藏經，今又發現阜昌丁巳年刻《成唯識編了義□鈔科文》，填補了版刻史上之空白。（1979年3月13日條，年譜頁607-608）

溯自1976年5月3日顧頡剛致譜主信也曾說：

竊有請者，吾叔精神充足，日與圖籍相親，正堪借此大好環境將百年來著書、刻書、藏書掌故日記一條，為我國近代文化留一目睹資料，尊意如何？

則如此部份，實在是很有意義的歷史材料，甚盼作者能將諸截出輯為成冊，嘉惠學界導覽，並為之補作吳大澂的年譜，不負譜主一生勤勉筆耕心血。

丙戌端陽完稿、丁亥春分校改於成都川大望江校區華西新村

¹⁸ 譜主自評其一生學術，「最有研究的還是小學，當年在燕京大學時就是學的這個，版本鑒定、書法都還是後來才搞的。因此，排列是一小學；二書法；三才是版本研究」（年譜頁581），顧頡剛此語可謂真知譜主。